

邊政學與邊政學人：

蒙古朋友李春霖

胡耐安

當我担任政治大學邊政學系系務後，檢點一下部頒的邊政學系課程科目，揣摩尋思了很久：這、該算是一個「邊政訓練班」吧？最可笑的、校定的譯稱，竟然是Frontier Administration然而，今何時時？所訓練出來的人幹什麼？真個還需要傅介子班定遠那類人才？中山先生在「民族主義」裏，簡明的昭示着國人：「各個邊疆民族，他們有其自然自治的權利」；何必要我們「越俎代庖」的去為之以治以理？何況，今日學生們所嚮往的遠大前程，是在海的那一邊；將何以為學生的「深造」「進修」打下基礎。當然，顧名思義，也應該為「邊政」留下點遺蹟，供史學家參考引徵。經過一番考慮，先談邊疆，識人識地識世；民族學、社會學、邊疆史地以及建設邊疆等；課程科目，大致是如此的定作準則。便將系的譯稱，報請教育部核准為Ethnology & Sociology，便利畢業生向外國學校申請深造研究。

「邊疆語文」的學與用

原來邊政學系，邊依部令規定，有「邊疆語文」科目，並且硬性規定必修一種，二十個學分；起初設蒙文藏文兩組，後加維文一組；維文由阿不都拉(佛滿)教；蒙藏文分由李春霖(曉山)歐陽

鶯(无畏)教；歐陽告辭，改聘羅泰益西繼任。阿不都拉、羅泰和歐陽，幸慶健在，祝福祝福。我對於「邊疆語文」：既感覺二十學分的是其多；又深知一種語文是否僅僅二十學分，就能够「講」「聽」「寫」全都以應用？而且，又無適當的「應用場所」；「齊傳禁休」，徒勞無功；雖曾向教部一再陳說，希望由必修一種，改為「任選」，就是可以不修；怎奈難以獲得「准予備存」。因為邊疆朋友，深以能留其語文傳授為必要；轉而要求減少一點如何？邊疆朋友，似乎也不願意。那時，打算「不幹」了之；禁不得劉校長的「友情」糾纏，又無法找得一個願意來幹的替人；擺脫不得，因仍舊貫；十多年來，眼望着學生們的愁眉苦臉，浪費却春去冬來，一年又一年，硬啃白吞，出了校門，無處可說可聽，縱然能講寫三言五句，但是，又有誰來欣賞？實在，歉疚于心的惶恐難安，誤了人家的青春年少，可不罪該萬死。

「蒙藏元老」李春霖

且說李春霖，這位純「漢化」姓名的蒙古朋友，別號曉山；我和他曾經在國立邊疆學校同過事，他在蒙藏委員會任蒙事處長時，我濫竽着委

員；後來，他也擢升了委員。他是蒙藏委員會的元老人員之一，民國十七年，建制蒙藏委員會時，他就參與籌備工作。曉山對蒙古語文造詣甚深，漢文的四書五經，也曾下過一番功夫；他教蒙文，常用孔子孟子說的，翻做蒙文教學生，加上他不大擅長辭令，未免難以使學生們滿意。老實說，這祇能怪學生程度不够，于老師乎何尤。恰好，那時我認識了扎奇斯欽(漢字姓名于寶衡)，便將曉山「包教」的三班蒙文，分了一班請扎奇教；曉山似乎不甚愜意。好在，曉山，他那素有修養的君子風度，對我並沒有面加責難。

後來，曉山曾經因「中風」在醫院耽了好幾個月，由扎奇權為代課。真是奇蹟，曉山那樣頭形嚴重的中風，經過治療後，居然康復無恙！祇不過走路時加帶了一根手杖。當扎奇到英國去教蒙文時，順理成章的，也便由曉山權代上課。真個「血濃于水」，蒙古朋友的族誼可敬；曉山與扎奇的彼此間，不再心存芥蒂，自無任何猜忌的可言了。

杯中日月寂寞身

曉山能飲，北方的白乾兒，他說他喝一兩斤是不會醉倒的。我和他在重慶同飲過，他確確實

實的喝了一瓶又多的大麪，我是自嘆不如的。來台後，住在詔安街公家的宿舍裏，也是日必一飲；他的家眷，三十八年在重慶撤退時，沒有來得及撤出。曉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老好人，眼見別人使巧賣乖的拖帶妻兒甚至僕從羣相出走；他却公而忘私，幸而還剩得隻身光桿兒隨着政府來到台灣；萬事不如杯在手，借酒澆愁，一天天的活下去，料不到中風脅迫他與酒絕了緣，烟捲兒也自日吸三十支而二十支十支而不吸了。

搬到泰山鄉蒙藏委員會的宿舍後，弄了架收音機放在床頭，大好時光，無可排遣，聽廣播，是他難以須臾離的要務。每週他來政大兩次，我便得和他見面兩次；他和我似是同庚？雖說他中過一次風，却也並不顯得十分衰老。有一天，正在暑假期間，有一蒙古老鄉專人送信給我，說李委員春霖死了；要我即刻去蒙藏委員會參與治喪會議。在治喪會中，聽到他的死，是受不了同宿舍一個不甚安分的鄉親刺激，便「突然」的死去了。曉山和我，相識三十多年，他樸實、誠謹，不受多說話，交託他的事，定必盡其力之所能為你辦好。取與之間，更是恰如其分；他的死，傳聞就是他的不肯濫與于人。身後事，多虧蒙藏委員會和蒙古同鄉為之料理，弔奠如儀，埋骨有所，此一孤苦老人，他死時似已將近七十歲？我贊美斯人的行誼，撰送一付輓聯：論行藏無坎神明是真善知識，臨變亂不私家室太上難忘情。像李曉山春霖如此好人，離亂之世，還能來到台灣，為蒙古文藝了點根；也算得沒有辜負此生。

扎奇斯欽多才藝

在我，也因為安排蒙文這一課程，和扎奇斯欽締交堪稱「知己」的友誼；他的夫人更常以「他能參與教授行列，全由胡先生，你的吸引之力」；對我不止一次的陳說謝意。扎奇每回自國外寫信給我，也是「每念盛情，不敢或忘」類此的語句；顯見蒙古朋友的情意殷拳。我絕不敢自承是「伯樂」，扎奇却實是在蒙古朋友中的傑出之士；他出身于北大，讀政治系，中英文均不差，對日抗戰終止；他和他們蒙古老鄉在東京住了一段不甚太長的時期，他却能琅琅上口的說日本話；可見吸收外國語文的才能，實非尋常人所可幾及。他「口才」好，能言善辯；反應敏捷，應付得體，確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最感歉疚的，是我對三位邊疆語文教師，始終不能獲得校方「由兼任」改為「專任」的同意。直待我引年告退的前一年，承扎奇，他慨允替我接棒，使我十多年的厭倦負累，得卸仔肩；這是我對「够朋友」的由衷感謝。同時，他也成為政大的專任教授，他在政大「專任」後，充分顯示着他的肆應長才；仰仗劉校長「撫字」功深的百般將就。例如，經我十多年來所希望的；將「邊政系」中文名稱，能與英文譯稱（Ethnology & Sociology）一致的稱做「民族學與社會學系」或「社會學與民族學系」；教育部與校方，深恐開罪了「邊疆朋友」；搓圓子式的遷延復遷延；直待扎奇，他得着以邊疆人身分的「人和」，終於「迎刃而解」。

蒙古學薪火相傳

可堪惋惜的時潮所趨，青年羣對於「邊政」這個詞意，所知有限；對民族的與社會的，在功利觀的影響下，也是了解不够；當然也就不以「

改稱」得到興趣，「出路」與「就業」雙重壓迫；苦累他，扎奇主任不免有用武無地的浩嘆。還有邊疆語文學分的減少，如果不是邊疆人的扎奇，也是難以如願的做到。終於東轉西轉，這個破爛攤子的收拾重任，又落到我這「殘薪」所傳的「火」，我的「高足」，兩位已取得教授資格的肩頭上。所系主任，交由他兩人担任，我當然希望他們能將「火光發旺」，但不敢樂觀。扎奇仁兄，由于姚從吾前輩，是以「蒙古學」享譽國際；關於蒙古文字，便得仰仗扎奇為之舉助；姚前輩對於後輩，是提携不遺餘力；扎奇的首度出國，去英國教蒙文，是由姚前輩推介。姚前輩逝世以後，獨挑大樑的任務便由扎奇承擔下來；從而，他海外行踪，也便頻繁起來；要不然，政大的邊政所系，一定會將爛攤子整頓得有聲有色。扎奇去美國已有兩年，他夫人也已去了美國，扎奇夫人伍雲格爾勒，系出蒙古世族，是扎奇的一位賢內助，她的簪花格小楷，常為扎奇謄正文稿。子女全已長大，個個學成業就；夫婦兩都是「國大代表」。扎奇對我，還是股拳無已的舊情莫忘，在他自美國寄我的信裏，充分流露着我倆「交情」的深摯。值得慶幸的，蒙古學，經李曉山之紮根于前，扎奇斯欽和後起的哈勒楚倫之灌溉于後；在冷淡中不致埋沒，厚望厚望。曉山泉下有知，自必更有其「吾道大行」的快慰吧。哈勒，尚在壯年；他是經我一手培植起來的新秀；由助教，而講師，而副教授，而教授，甚願他努力進修，將蒙文推行有其前途。在我，可不也是「與有榮焉」？渴望渴望。